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6 月 1-2 日)

1、《华尔街日报》：评析沙利文与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

5 月 30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了专栏作家威廉·加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的文章《杰克·沙利文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文章认为,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4 月就经济和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讲值得更多关注。该演讲反映了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根本变化,并提出了对过度市场化政策的替代方案,即“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回顾历史,美国制造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趋于稳定:实际工资上涨,工人生产率提升,但就业岗位并未有显著增加。随后,自 2001 年至 2007 年末大衰退伊始,美国失去了 34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约占岗位总数的 20%。到经济衰退结束时,又流失了 200 万个岗位。这些损失大部分是永久性的,导致许多城镇和农村受到重创。上述事态发展助长了从现代茶党兴起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达到高潮的民粹主义反抗,以及两党对自由贸易协定支持的减弱。文章归纳了沙利文的主要论断:其一,过去的市场政策“掏空”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对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战略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其二,经济一体化的预期并未实现,中国的

崛起给美国带来多重冲击。沙利文的应对措施的核心是“现代美国工业战略”，该战略将公共资金投资于对经济创新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部门——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传统公共产品。将新贸易协定的重点从增长关税转移到促进安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等国家目标上。文章指出，这种转变在民主党内部亦面临质疑，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担心，美国政府过度关注制造业而低估消费者成本的重要性。同时，“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尽管两党对后冷战时代以市场为中心的政治支持已经减弱，但替代方案仍处于辩论之中。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s-foreign-policy-for-the-middle-class-manufacturing-trade-protectionism-jake-sullivan-donald-trump-8e6ab7a1?mod=opinion_featst_pos1

编译：赵书韞

2、布鲁金斯学会：“去风险”与对华政策

5月30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客座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葛维宝的署名文章《词语与政策：“去风险化”与对华政策》。文章指出七国集团(G7)国家最近就其对华经济方针的核心部分——“去风险”——以及同样重要的“去风险，而不是脱钩”达成一致。但在现实中，如果无法对“去风险”这个词下一个清晰的定义，那么反而可能造就分歧而不是共识。关于“去

风险”的含义及其应用中可能存在的分歧，文章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是对“去风险”的“去”的解读。美国国务院将“去风险”定义为“避免，而不是管理风险”。不同的定义将产生非常不同的“去风险”政策，如果一国将其与中国的“去风险”目标定义为“消除”相关风险，而不是“降低”风险，那么该国采取的行动将是更加彻底且全面的。第二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是什么算作相关风险。“去风险”的潜在范围和与中国的经济分离程度取决于哪些问题被视为相关风险。美国政府在讨论与中国的经济分离时援引的最常见风险是国家安全风险，这可能意味着与中国脱钩。除了“国家安全”之外，许多其他涉及中国的问题都可以纳入去风险政策中，例如人权。去风险还包括解决中国带来的各种经济风险，如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并抵制经济胁迫。去风险化的第三个主要不确定性是，在决定是否应该对中国采取行动以及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时，如何评估特定的风险，并将其与一个国家的其他国家利益相平衡。文章最后强调，就“去风险”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是绝对重要。“去风险”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但是，必须对这个词进行解释，赋予其意义，然后再设想出行动。直到行动取代语言，才会知道所谓“去风险”政策是什么。但可以合理预测的是，不同国家的“去风险”政策将大相径庭。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3/05/30/words-and-policies-de-risking-and-china-policy/>

编译：余懿

3、《大西洋理事会》：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危机中面临失败

5月30日，《大西洋理事会》杂志网站刊登大西洋理事会乌克兰警报服务编辑彼得·迪金森（Peter Dickinson）的《俄罗斯的新现实》。文章指出，乌克兰危机以来，普京的国际地位下降，俄也遭到国际排斥，处于孤立状态。乌克兰则获得了大部分国际支持，成为关注的焦点。普京对苏联解体存在不满，并认为乌是俄的一部分，试图建立新的俄罗斯帝国，以闪电战夺取胜利。但俄军在战场上遭到失败，损害了俄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声誉。作者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现代最大的地缘政治错误之一，使俄的国际地位被大大削弱，普京效仿彼得大帝的梦想终将破灭。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russias-new-reality-less-peter-the-great-more-putin-the-pariah/>

编译：罗柳青

4、《外交学人》：中俄外长将在南非会晤，普京可能出访备受关注

5月31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美联社专栏作者、《外交学人》客座作家莫戈莫齐·马格姆（Mogomotsi Magome）和杰拉尔德·伊姆雷（Gerald Imray）的文章《中俄外长将在南非会晤，普京可能出访备受关注》。文章指出，中俄外长

将在开普敦与金砖国家经济集团的外长会晤，这将是今年八月在南非举行更大规模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前奏。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可能会在受到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出席峰会。文章认为，西方国家显然正在担心南非与俄罗斯结盟，并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将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向中国与俄罗斯。作者写到，分析人士称峰会可能会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金砖国家扩大，接纳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新成员；金砖国家通过建立金砖国家货币体系的决议。2023年4月，包括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至少19个国家已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联盟。作者分析，尽管在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的国家引入共同货币会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正式决定采用共同货币仍然可以被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声明”，并启动世界部分地区的去美元化进程。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5/possible-putin-trip-in-spotlight-as-russia-china-foreign-ministers-set-for-meeting-in-south-africa/>

编译：聂子琼

5、《外交学人》：中国正在提高其在中间地带运作的能力

6月1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苏凡中心研究主任科林·P·克拉克（Colin P. Clarke）文章《中国正在提高其在中间地带运作的能

间地带运作的能力》。文章指出，中国依靠跨地缘政治、经济及网络行动等手段推进国家利益。作者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乌克兰冲突期间增强了对信息的掌控，通过网络宣传影响社会舆论。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英文媒体也与网络宣传相配合，大力传播中国热爱和平的国际形象。通过宣传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强调其在中东外交中的努力，从而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作者表示，随着掌握新兴技术的门槛降低，网络宣传将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应该意识到网络行动的重要性，并思考如何在信息方面遏制对手。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6/emulating-russia-china-is-improving-its-ability-to-operate-in-the-gray-zone/>

编译：施畅

6、《报业辛迪加》：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民主和全球秩序

5月23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西班牙IE大学教务长、政治经济和全球事务学院院长曼努埃尔·穆尼兹（Manuel Muñiz）及观察者研究基金会主席萨米尔萨兰（Samir Saran）的合撰文章《人工智能、民主和全球秩序》。文章指出，外交官和国际政策制定者过去一直将技术视为属于能源、财政或国防的部门事务，但突破性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迫切需要更全面与全球化的技术治理方法。当前人工智能工具的变革性发展在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发展将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

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将极大改变全球权力的来源、分配和投射，提升国家进攻和防御能力，并为竞争和冲突创造全新领域。此外，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对人类基本权利自由、人际关系甚至信仰产生重大影响。其反馈循环和数据依赖将加剧智能模型的现有偏见，并使国家本已脆弱的社会契约更加紧张。因此，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在全球层面需更优治理。文章建议，第一，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危害应达成众多国际协议，包括在联合国层面限制致命自主性武器在战场使用，及签订网络空间监管协议。第二，建立新贸易法规，并确保公平竞争的数字经济环境。第三，应支持教科文组织创建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并推动制定全球数字权利宪章。第四，技术外交的重心应为制定与新兴大国接触的新战略。由于未来庞大的经济体量与技术用户规模，西方经济体应处理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与印度接触应是美欧优先事项。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i-global-governance-urgent-need-for-liberal-democracies-by-manuel-muniz-and-samir-saran-2023-05>

编译：张丁

7、卡内基欧洲：乌克兰危机颠覆了德国外交政策

5月30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Carnegie Europe）刊登高级研究员朱迪·登普西（Judy Dempsey）的

评论文章《乌克兰危机颠覆了德国外交政策》。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德国政治精英及公众改变了对俄看法并改变了 1990 年之后的外交政策，即使战争结束也很难恢复原有观点。德国外交政策包含三个支柱：一是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二是欧盟的经济和政治支柱，三是关键因素俄罗斯。德俄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天然气换管道”的交易、近几个世纪以来德俄复杂而动荡的关系、工业界和游说团体的影响都阻止了德精英将东欧国家视为自己的权利。即使 1991 年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独立，德仍会审视新独立国家并将其看作俄罗斯势力范围。这一观点塑造了德对北约、欧盟和俄罗斯的政策，即以牺牲东欧为代价而达成目标。乌克兰危机促使该利益三角发生变化：一是北约做出调整，德必须通过北约和国内努力实现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二是欧盟也在改变，德需要帮助实现“完整而自由”（whole and free）的欧洲大陆，这意味着完成东欧的艰难转型；三是德国改变了对俄看法，并有机会让东欧成为新三角关系的第三边。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89845>

编译：刘力凤

8、洛伊研究所：印度采取与各方接触却不亲近的外交政策

5 月 31 日，洛伊研究所发布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韦德·辛德（Ved Shinde）所撰文章《印度的外交姿态：不仅

仅是拍照留影》。作者指出，就外交活动而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行程满档。莫迪结束东方之行回到德里，将于6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印度作为非美方条约盟友国，此次访问十分罕见。在莫迪过去几年的领导下，印美关系愈发亲近。未来3个月莫迪的外交政治秀将迎来高峰。在亚洲，印度将于7月初在德里主办上合组织峰会，并坚持认为上合组织是与中亚各国交往的论坛，与中国保持对话畅通的渠道。考虑到与中国长达3500公里的边境线，印度不希望单纯被纳入美国阵营。在欧洲，莫迪还将于7月访问巴黎，同时作为贵宾出席法国国庆日阅兵。获得欧洲支持，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莫迪会谈的关键组成部分。金砖国家峰会将在莫迪访问欧洲后举行，而莫迪的外交行程将在9月德里主办G20峰会时结束。在过去几个月，莫迪政府煞费苦心地强调印度在峰会季的压场，印度全球领导地位的口号甚嚣尘上。批评者认为，与所有国家合作反映出战略上的混乱，吸引所有人等同于与任何人都不亲近。印度没有联盟或条约伙伴来挽救糟糕局面，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此外，印度崛起为大国的说法并没有强大实力作为后盾。然而，支持者认为印度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地缘政治敏锐性和战略理性的产物。印度在多边论坛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各国领导人纷纷向印度总理示好。作者认为，现实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成熟的大国会与各方不同程度接触。印度已摆脱对西方的历史犹豫，加快向美国及其欧洲、中东和亚洲盟友靠拢。

由于“两线作战”的威胁一直悬在头顶，这种转变是出于对权力平衡的考虑。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india-s-diplomatic-poise-not-just-about-photo-ops>

编译：黄思予

9、IISS：乌克兰危机与全球集团化政治趋势

5月30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布地缘政治高级顾问约翰·雷恩（John Raine）所撰评论《乌克兰战争的遗产：是否会降下“丝幕”？》。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必将引发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调整，在该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中美俄，而是亚洲和中东的中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结盟选择。文章称，尽管集团分裂在政治和经济上无益于东西方的任何一方，但东西方间存有“丝幕”（Silk Curtain）降临的风险。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诸多中等大国维持对俄关系并违背美国制裁号召，这一倾向已威胁到美国霸权的三大传统支柱：外交、防务和美元。在外交层面，中国成功调停沙伊冲突，叙利亚也重返阿盟，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变动对美不利，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对中等大国颇具吸引力，新兴国家寻求的外交平衡正给全球秩序带来新的改变。在防务层面，美国仅保持着纸面上的主导地位，同时还要兼顾各项全球承诺，对于那些依赖美国准备在域外使用其武装力量的国家来说，美国政治文化愈发倾向于国内安全而

不是直接的外国干预，这些都让他们感到不安，加之从阿富汗的仓促撤军，美主导安全秩序的能力受到质疑，受美国安全保障的国家也开始寻求防务装备和军事培训的来源多样化。在金融层面，美国的经济制裁未能扭转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行为，却激起其他国家“去美元化”的愿望，中国正谨慎推进人民币可兑换，金砖国家间也表现出对彼此货币的兴趣，持有美元并与东方进行大量美元交易的新兴中等大国能对美元地位产生决定性影响。乌克兰危机后出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框架肯定会有所不同，但它可能不会决于主导者，而是取决于中等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选择。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3/05/the-legacy-of-the-war-in-ukraine-will-a-silk-curtain-fall/>

编译：吴子浩

10、《外交学人》：为何美国银行业的疲软不太可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

5月31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金融专家詹姆斯·吉尔德（James Guild）所撰文章《为何美国银行业的疲软不太可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文章指出，最近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动荡可能让一些观察家对东南亚银行的健康状况产生怀疑，但同样的问题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文章首先剖析了硅谷银行产生挤兑的金融原理。一方面，由于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封锁，人们

倾向于将存款闲置于银行，致使存款增长速度比平时加快。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银行对发放过多的新支贷款的意愿下降，导致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一批银行转而将资产投资于证券，未能有效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随着疫情的好转，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些投资的市场价值下降了，导致了银行因各种原因而被挤兑。文章进一步指出，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银行之所以较少受到此次疲软的波及，主要得益于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印尼银行的存款没有过快增长，且并未像美国政府一样发放支票、而是以实物和减免的形式为民众提供补贴，进而控制了存款增长的速度。二是，鉴于历史上多次席卷的金融危机的教训，印尼的银行在运作上相对保守，尽管在疫情期间证券组合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但是仅占资产的 31%，而贷款组合仍占主体，为 53%，这与硅谷银行过度倾斜于证券的资产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此，文章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的银行通过像老式银行一样运作，专注于存入贷出的基本业务，有效地对冲了大流行下挤兑的风险，进而使其能相对稳健地应对来自美欧的银行业萧条的冲击。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5/why-weakness-in-us-banking-is-unlikely-to-spread-to-indonesia/>

编译：肇冠同

编译：赵书韞、黄思予、余懿、吴子浩、肇冠同、施畅、聂子琼、张丁、刘力凤、罗柳青
审核：贺刚、申青青、郑乐锋、周武华